



宋史学者李华瑞加盟浙大,听这位学术大咖聊聊他的新观点

宋型国家 造极之世



本报记者 马黎
通讯员 郭楠

宋史学者李华瑞最近出版了新作《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》。

李华瑞是谁?

去年,他加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成为敦和讲席教授,又当选中国宋史研究会新任会长。

李华瑞师从宋史学家漆侠先生,主要从事宋史、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。前不久,他在浙大做了一场关于“夜生活”的讲座——宋朝夜间经济兴盛的特点和原因。我们从题目里就感觉到了,很接地气。如何从宋代的经济文化看到我们的生活?比如,宋代的画市场怎么样?中国什么时候有烧酒,是自创的吗?宋代的酒销量又怎么样?李华瑞的研究,如代表作《宋代酒的生产 and 征榷》都跟生活息息相关。

最近,钱江晚报记者和“北鸟南飞”在杭州安家的李华瑞聊了聊,说说他来浙江后的新动向,尤其是关于宋韵文化,关于“宋型国家”的思考。

我们现在提到宋朝,喜欢借用陈寅恪先生的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这句话,我们真的理解对了吗?还有,宋朝为什么要鼓励消费?

听李华瑞说。



1

钱江晚报:为什么您会加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?

李华瑞:我算了算,50后还在宋史研究一线发表文章,做具体研究的,可能就六七位了。现在研究的主力基本已经转到60后、70后这代人了。

浙大的宋史氛围很好。过去老杭大就是宋史研究的重镇,现在浙江大学做宋史的有六个人,祖慧(龚延明的博士,教授),陆敏珍(包伟民的博士、教授)、周佳(邓小南的博士、副教授)、何天白(祖慧的博士后),还有吴铮强(包伟民的研究生,刚评上教授),再加上我。

在全国,有五个人以上做宋史研究(宋史研究所)的大学,就河北大学、河南大学、西北大学、上海师大、浙江大学。现在全国做古代史的历史系,人数就不多。浙大这五个人的方向非常集中,全部做宋史。再加上龚延明先生虽然年过八十了,还在继续做。所以我到这儿来,只是锦上添花。

钱江晚报:漆侠先生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?

李华瑞:漆侠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我出生在甘肃山丹县平坡,在平坡度过了整整20年。我在甘肃师范大学读书时,对历史专业兴趣不高,曾一度想读新兴的人口学,发现基础太差,放弃了,回过头来学历史,又想学世界史,发现世界史的硕士学位点太少了,考不了研究生,就考了宋史。1987年之后,我考了漆老师的博士,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境界,让我坚定做宋史。

钱江晚报:来浙大后,您有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吗?

李华瑞:我近期在修订将要再版的两部书,一本是《宋夏关系史》,还有一本《王安石变法研究史》。国家重点课题《西夏文明史研究》已完成初稿。我到浙大后,在“宋型国家”这一块的研究上要再作深化。

2

钱江晚报:您最近刚刚出版了《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》,这也是您这几年一直在研究的重点。怎么理解“宋型国家”?

李华瑞:我之所以提出“宋型国家”,和21世纪以来“唐宋变革论”重新被炒热有很大的关系。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,域外学者曾给宋朝国家文明以极高的评价,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唐宋变革论,由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,把宋代作为中国社会历史近世的开端,简称“宋代近世说”。

为了证明“宋代近世说”的发展脉络,大多数人把讨论11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,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,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。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,又被侧重于君主、士大夫和科举制,即“精英”文化、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。一言以蔽之,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。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(所谓的研究)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。

陈寅恪先生讲华夏文化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。宋朝的文化造极表现在哪里?

宋朝文化在华夏历史上造极的表现是经济和文学艺术,也包括宋学。宋学中的程朱理学对宋朝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,是在南宋后期的七八十年间,在北宋影响甚微。而且宋朝经济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与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格格不入。如果这种思想主张占统治地位,宋代文学还能出现六大散文家、宋诗宋词的一代文学之胜吗?还能出现世界范围内宋朝农业经济达到最高水平吗?

为什么元明清经济文化不如宋朝的经济文化呢?很大原因是程朱理学。程朱理学在经济上的

“义利观”特别反对赚钱,而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讲究赚钱的朝代。

我一直在提倡“大宋史”,这是邓广铭先生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一种研究理念,旨在强调前后并存的辽、宋、夏、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,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。“大宋史”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唐宋变革论的。这是我提出“宋型国家”的背景。

“宋型国家”我主要讲到四个问题,主要是指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晚清这2000多年间,宋朝独一无二的方面。

一是宋朝时期,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碰撞的新格局;

二是为什么宋朝工商业税收收入大大超过农业税收,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,造成宋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;

三是文官政治,从汉唐到元明清都讲文武平衡,但就只有宋朝是士大夫政治;

四是宋学,汉学宋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两大学术高峰,宋朝讲制度,但更讲人。黄宗羲说,学经学,应当要学汉学,学怎么做人要学宋学。这四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对“唐宋变革论”的回应。

有关“宋型国家”的具体讨论还处在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,我的基本想法在2019年出版的《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》和去年出版的《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》都有述说,在这里就不多谈了。

3

钱江晚报:对于现在“宋韵文化”的研究,您认为有哪些方面需要重视或者还是缺失的?

李华瑞:从我个人角度,一定要把握宋学发展脉络。从学术思想,宋学吸收了佛学和道教,新产生的儒学在思辨、在哲学的层面上高于汉学。

讲到宋学,还要补充宋学主流对《孟子》的推崇,《孟子》的地位是宋人抬起来的,其功臣主要是王安石和朱熹。现今所谓的孔孟之道始自宋朝。汉朝的儒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,而宋儒正好相反,对于政治、法律、财政、军事等制度的实施,主要是“在治人不在治法”,也就是说,把管理这些事务的人教育好,政务财务军务等自然就会做好,至于具体的相关制度的制定交由专门机构去处理,因而宋人不厌其烦地研究和关注于社会教养之道。这是宋韵最需要把握的地方。宋学的主流学派王安石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,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,但是将培育高尚的人伦精神,作为建立小康社会的终极目标则是一致的。

宋韵第二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宋人的“淑世精神”,宋儒与汉儒不同的地方是,宋儒不仅学习领会儒家思想,而且要亲自实践儒家的理想,王安石变法和朱熹推进道学运动都是这种实践的努力。

宋韵第三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,宋朝是一个讲功利的时代,宋朝其所以在经济文化取得汉唐不能企及、明清不能超越的高度,是与宋代绝大多数时间讲求功利分不开的。

宋韵第四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的韵味。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,出现了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,北宋的人才被南宋继承了下来,到杭州来,就不会感觉有差异化,它有南方鲜明的特色,但包容度又很大,这就是宋韵。

从思想文化的传承而言,更应加强对浙东学派思想的研究,特别是浙东学派对南宋统治者和杭州社会发展的影响。江南成为全国的江南主要是在功利思想主导下成就的,浙东事功学派起着很大的作用。

我们现在强调宋朝的文化思想、文学艺术,但对宋朝的文武制度研究不够。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回避的话题:宋朝是个文强武弱的时代,真正揭示导致宋朝文强武弱的文官政治的书迄今似未看到。

(更多内容请扫左边二维码)

全民悦读



马黎

透物见人



扫码提取更多内容